

心慕“神韵派” 诗多“杜陵篇”

——论启蒙思想家郑观应的诗艺与诗观

龚刚

(澳门大学 中文系 澳门 00853)

[摘要] 郑观应的诗作为“直记其事”的“杜陵篇”,而非意在言外的神韵诗;郑观应的以书写“诗史”自命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与他熟稔于心的“神韵派”诗论存在多重差异与对立,这种对立并不意味着郑观应在诗学观上的自相矛盾,只是凸显了艺术理想与现实需要的差距。郑观应深知自己的诸多救世诗难称大雅之作,但出于“救国苦心”,他还是要以诗的形式“大声疾呼”,以达到启蒙醒世的功利目的。这正是少学老庄、“不愿封侯愿学仙”的郑观应的无奈,也是他的伟大之处。他本可自度,却不满足于自度,他还要救世度人;他本可唯美,却不甘于唯美,他还要以诗劝世。这种情况可以称之为救亡压倒了审美。也就是说,郑观应出于“为人生”的目的,而在一定程度上搁置了他的诗学理想,其仁心侠义,足当诗侠之誉。

[关键词] 郑观应;诗学理想;创作意向;《沧浪诗话》

[中图分类号] I 207.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917(2012)02-0042-08

世居澳门、以煌煌巨著《盛世危言》著称于世的郑观应(1842~1921年)既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巨的启蒙思想家、工商实业家,也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造诣殊深、颇具开创性的旧体诗人,在清初以还的岭南诗派中,可说是卓然自成一家。其主要诗集《罗浮侍鹤山人诗草》(有戊戌、己酉两个版本,“侍”亦作“待”)、《罗浮待鹤山房谈玄诗草》,分别表现出儒家的经世之志与道家的出世之想,所谓“情殷匡济,复慕长生”^①,“由任侠而入于神仙者”^②。从人格修养上来说,任侠与修道的结合,体现了儒道互补的古典人文精神;从诗歌艺术上来说,郑观应的“血性忠义”佐以“道气灵明”^③,又使其诗“多杂仙心”^④,即便是不避俗词和新词的记事、议论之作,也常有超迈之姿、俊逸之气,非等闲俗语诗之可比。

郑观应的同时代人、也就是将《盛世危言》推荐给光绪帝的邓华熙评论郑观应的诗艺说:“吾闻

粤诗派代有闻人。国初屈氏、陈氏、梁氏刊成合集,鼎峙争雄,世称岭南三大家,脍炙人口。迨七子继之,二百年来瓣香弗替。……余稔知山人,读山人诗,知有立乎诗之先者。他日传播艺林,与三家七子齐驾并驱,吾粤闻人又增一席,不其盛欤!”^⑤康熙三十一年,明末诗人王邦畿之子王隼将清初广东诗人梁佩兰、屈大均、陈恭尹的诗作合编为《岭南三大家诗选》。此后,“岭南三大家”渐渐得到时贤后人的认可,并促成了岭南、中原、江浙诗坛鼎足而三的格局。三大家中的梁佩兰尚有清初粤词大家之誉,又与程可则、陈恭尹、王邦畿、方殿元、方远、方朝并称“岭南七子”。邓华熙将郑观应视为可与“三家”“七子”并驾齐驱的岭南诗人,对其推崇备至。

无独有偶,郑观应的密友盛宣怀在评说其诗的文学史地位时,也以“岭南三大家”作为参照“粤峤多畸人逸士,其以诗自鸣者,自屈、梁、陈三家而后,风雅递嬗,代不乏人。海通以来,迄乎近世,其

[收稿日期] 2011-10-16

[作者简介] 龚刚,男,浙江杭州人,清华大学哲学系伦理学博士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为澳门大学南国人文研究中心学术总监,中文系博士生导师。

① ④ 《罗浮侍鹤山人诗草》胡昌俞序,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 《罗浮待鹤山人诗草》夏同龢序,同上。

③ 《罗浮待鹤山人诗草》吴广霈序,同上。

⑤ 《罗浮待鹤山人诗草》邓华熙序,同上。

能负专对之才,有干世之略,而仍不废啸咏,名章俊篇,照耀坛坫,号为诗界中新巨子者,吾于嘉应得黄公度廉使、番禺得潘兰史征君、香山得郑陶斋兵备。……夫孰知其耽玩道真,萧闲物外,一槩荧然,捻髭微吟,固欲于岭南诗派中占一席哉?”^①

邓华熙、盛宣怀不约而同地以最负盛名的岭南诗人与郑观应相提并论,可见他们对郑观应诗艺的推崇。盛宣怀还进而将郑观应与同时代的广东诗人黄遵宪、潘兰史并称为“诗界中新巨子”,颇有隆重推出“岭南新三大家”之概。

相较于邓华熙、盛宣怀二子仅于明清岭南诗人的范围内衡量郑观应的诗歌水平,胡昌俞、刘麒祥、萧荣爵等诗人对郑观应诗艺的评价则超出了地域和时代的藩篱,直指有“诗仙”“诗圣”之誉的李白、杜甫。刘麒祥称郑观应“诗情如杜甫,雅韵若青莲”^②,萧荣爵则称其“伤乱每编王粲句,感时常写杜陵篇”^③,胡昌俞则说“陶斋为诗不规规于太白,而甚似太白,……以陶斋胸怀浩荡,固天际真人之邈不可攀者,直上与唐贤相颉颃。”^④胡昌俞的这一评语将郑观应提升到了与李白颉颃的高度,可以说是迄今所见的对郑观应诗艺的最高评价。

且不说郑观应的诗艺是否达到了邓华熙、胡昌俞等人所说的水平^⑤,但对于这样一位备受同时代

诗人、诗评家推崇的近代诗人应该予以足够重视,并对其艺术地位给予更精确定位,则是近现代文学研究中不容忽视的课题。

数据显示,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已有学者对郑观应的诗歌进行了初步介绍,但直至80年代之前,人们对郑观应的研究还基本停留在政治、经济等方面。80年代之后,研究的触角开始深入到郑观应的散文、诗歌领域,在诸多有关中国近代文学史的著作中,对郑观应的散文成就和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⑥,同时也有专文对郑观应的诗歌创作进行了初步探讨,郑观应的三部诗集《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罗浮待鹤山房谈玄诗草》《待鹤山人晚年诗草》也在这个时期汇编出版。90年代以后,一批以岭南学者为主的研究者先后发表、出版了诸多评论郑观应的专文、专书,对郑观应诗歌的特色、价值、风格,及其在题材的开拓、语言的革新、触觉的延展、思想的深化等诸方面的造就,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和总结^⑦,纠正了当代某些学者所谓郑观应的诗作“多发议论,质朴无文,有文献价值而缺乏艺术价值”等片面之论^{[1]719},也扭转了近现代文学研究中长期忽略郑观应诗歌艺术成就的局面。

应该说,关于郑观应诗艺的研究,迄今已取得长足进展,但对于郑观应的诗学观,却依然罕有论者。笔者以为,诗艺与诗学观,如鸟之双翼,兼重

① 《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盛宣怀序,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 《罗浮待鹤山人诗草》刘麒祥题词,同上。

③ 《罗浮待鹤山人诗草》萧荣爵题词,同上。

④ 《罗浮待鹤山人诗草》胡昌俞序,同上。

⑤ 笔者以为,郑观应虽不足与“诗仙”“诗圣”并称,但其人有血性,其诗有奇气,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堪称近代“诗侠”;其《罗浮待鹤山人诗草》开卷第一篇即是《侠客行》,此外,他还编刻有《剑侠传》一书,可见他本人颇有以侠客自许之意。

⑥ 马良春、李福田总主编的《中国文学大辞典》赞誉郑观应是“近代早期卓有成绩的散文家”,并冠之以“近代散文家”的桂冠,参见《实业诗人第一家——郑观应诗歌研究》,澳门近代文学学会2000年版。

⑦ 邓景滨《实业诗人第一家——郑观应诗歌研究》一书在全面总结郑观应的诗歌艺术成就方面,具有开拓性的意义。该书对郑观应诗歌的内容进行分析归类,又从诗歌的特色和价值这一角度,指出郑观应诗歌的风格既有慷慨激昂、豪气干云的一面,又有恬淡清和、温醇朴实的一面。并认为郑观应的诗虽以直抒胸臆为主,但亦不乏形象生动、富有诗意的描绘,在题材的开拓、触觉的敏锐、思想的深度诸方面,堪称走在同时代诗人的最前列。郑观应诗歌中最具特点、最有价值的是实业诗,其价值在于展现了中国近代创业史筚路蓝缕的艰辛历程,开拓了旧体诗题材的新领域。邓景滨还编选了《郑观应诗选》(澳门中华诗词学会1995年版),精选了郑观应各类诗歌的代表作,有助于了解郑观应诗歌的概貌。近年来以郑观应诗歌研究为主题的论文主要有: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方志钦《郑观应诗歌的爱国情怀》、广东省文史研究馆李文初《郑观应诗歌的评价问题》、广东省中山市文化局刘居上《解读郑观应》、中山大学历史系章文钦《郑观应的澳门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罗浮待鹤山人诗草〉中的变法自强思想》、苏州大学中文系马卫中《郑观应诗歌及其诗歌研究之价值》、安徽师范大学郑红群《诗情如杜甫,雅韵若青莲——试论郑观应的诗作》等。这批论文多为由澳门历史学会、澳门历史文化关注协会主办的“纪念郑观应逝世80周年学术研讨会”(2001年),以及由澳门历史文化关注协会、澳门历史学会、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等机构主办的“纪念郑观应诞辰一百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2002年)等会议上所提交的论文。澳门学者及学术、文学团体对推进郑观应这位“世居澳门”的近代文化名人的综合研究,尤其是在推进郑观应的诗歌研究以及为其诗歌艺术成就正名方面,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诗艺与诗学观的研究,才能使郑观应的诗歌艺术研究趋向完备。在郑观应诗歌艺术研究的范畴内,邓景滨《郑观应的诗歌创作观》^①一文是迄今仅见的一篇较全面地论述郑观应诗学观的专论,该文认为,郑观应在诗歌与社会关系方面,主张“直记时事”“寓意规谏”;在诗歌与感情关系方面,主张“吟咏性情”“畅叙襟期”;在诗歌与形式关系方面,主张“不拘格调”“不取法古人”;在诗歌与语言关系方面,主张“力扫靡词”“文字尤贵显浅”。该文还总结说,在近代诗歌口语化和白话化的道路上,郑观应确乎比颇负诗名的黄遵宪迈进一大步。

邓先生关于郑观应诗歌创作观的评述,对进一步开展郑观应的诗学观研究,实有筚路蓝缕之功。本文拟从比较分析郑观应的三篇诗集自序入手,对郑观应诗的类型、郑观应的诗学观与《沧浪诗话》的关联性、中国神韵派诗论与西方象征主义诗论的相通性、郑观应的诗学理想与其主导性创作意向的对立、郑观应的尊唐倾向等问题,进行较系统的论述。

一、郑观应的三篇诗集自序

郑观应的一生,以经世之志度人,复以修道之心自度,“本不欲以诗自鸣”,更无心作诗论,故没有留下什么诗学专论,但诚如有学者所言,“我们可以透过他的诗集中的两篇自序、诗作中的有关小序和诗句去追寻、探讨他的诗歌创作观,并从中清晰地看到他的诗歌主张是属于新诗派范畴。”^[2]

以笔者的视野所及,郑观应诗集中的自序至少有三篇,而不只两篇。由于这三篇自序篇幅都不长,并且是全面了解郑观应诗学观的难得的文献资料,兹照录如下:

《罗浮侍鹤山人诗草》戊戌本自序

幼而失学,何敢言诗。心有所感,信笔赋之。华彝交涉,陵谷迁移。疾风过后,新月来时。若逢佳士,畅叙襟期。频频驿使,传达遐思。一腔热血,三寸毛锥。聊抒闻见,贤于弈棋。不计工拙,力扫靡词。旁及惩劝,用自箴规。匡庐山人,索付刚削。就正有道,攀效东施。希加绳削,藉奉师资。

《罗浮侍鹤山人诗草》己酉本自序

《沧浪诗话》论诗之法有五体:曰体制,曰格

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其用工有三:曰起结,曰句法,曰字眼。其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无尽矣。斯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甚寡。夫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涉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性情也。盛唐诸人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其真妙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然于一唱三叹有所歉焉,非古人之诗也。

余本不能文,何敢言诗。惟于家国之事伤心惨目,有闻自外人论我国利弊关系大局,往往梦寐不安,为之行愁坐叹,虽已上书当道,而人微言轻,置若罔闻,未由展布。故自忘鄙俚,复随手写录,几不成为韵语,或五言,或七言,寓意规谏,大声疾呼,以期上下一心,重见唐虞盛世。所谓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直记时事,不避嫌怨,不拘格调,既不取法古人,又无入神之句,自知不足以登大雅之堂。但救国苦心妇孺皆知,一览即印入脑际,或于数十年后,无人不忆及当时事势,则中人以下与泛泛吟咏不同。且文字尤贵显浅,是直可为拙诗藏拙也。尚冀吟坛诸君勿谓入口无味,以其覆瓿,则余之幸也夫!

《罗浮侍鹤山人诗草》戊戌本自序

浮生若梦,富贵靡常。风灯草露,石火电光。不修大道,终落空亡。参同悟真,警世谆详。观应童年,愿学老庄。寻师向善,艰苦备尝。所闻小木,语半荒唐。不入空寂,便是邪狂。徒劳精力,心命惶惶。初师东海,筹置丹房。未经入室,已致倾囊。罗浮访道,复叩彭张。讲活子时,返照回光。先天祖气,药中之王。重游沪上,遇师万扬。始知元妙,四个阴阳。体隔神交,火候甚详。九还七返,既寿且康。居易俟命,以待输将。混迹麀市,觅侣求黄。潜修夙志,何日相偿。聊摭所得,寄托诗章。附录敲爻,白龙洞歌,言简意赅,莫不包罗。

^① 首刊于《岭南文史》1995年第2期。

蒙奚敢和,步韵非他。敬述蠡测,用以切磋。方内散人,南宗九律。金丹真传,若合符节。北派九律,龙门口诀。辨道之诗,一腔热血。汇付手民,公诸贤哲。以期参证,同登金阙。

据郑观应自署,《罗浮待鹤山人诗草》戊戌本(以下简称“戊戌本诗草”)自序及《罗浮待鹤山房谈玄诗草》(以下简称“谈玄诗草”)自序分别作于光绪戊戌仲春及光绪戊戌中秋,也就是1898年5月和1898年9月30日,间隔时间仅约半年,而且正好在戊戌变法开始(1898年6月11日)之前与戊戌变法失败(1898年9月21日)之后。《罗浮待鹤山人诗草》己酉本(以下简称“己酉本诗草”)自序并无自署,但这个版本由盛宣怀于“己酉秋孟”题签^①,据此推断,郑观应撰写“己酉本诗草”自序的时间应当就在这一年,也就是清宣统元年1909年,距光绪戊戌年已有11年。

对照作于同一年的“戊戌本诗草”自序与“谈玄诗草”自序,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郑观应心境的变化。在为“戊戌本诗草”作序时,戊戌变法正在酝酿期,郑观应虽然对康梁的激进持“事速则不达”的保留态度^②,但毕竟同为维新派,所以他在变法的前夜还是颇感兴奋,所谓“疾风过后,新月来时。若逢佳士,畅叙襟期。频频驿使,传达遐思。一腔热血,三寸毛锥。聊抒闻见,贤于弈棋。”恰恰表现出一种同声相应、报国有门的风发意气,其所谓“畅叙襟期”“传达遐思”,并非文人墨客寄情风月之闲兴,实为仁人志士同道为谋之豪情。然而,寄托着诸多维新志士梦想的百日维新转眼以失败而告终,力主变法的光绪帝被慈禧太后囚禁于中南海瀛台,同年9月28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害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郑观应的心境也随之低落,所谓“浮生若梦,富贵靡常。风灯草露,石火电光。不修大道,终落空亡。”虽是悟道之言,却分明隐含着变法不成、徒呼奈何的沉痛之感。几乎在同一时间,以“保荐匪人”的罪名被革职流放新疆的前礼部尚书李端棻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怕听中秋月有声,要从菜市哭忠贞。幸予被遣为迁客,匹马秋风出帝城。”两相对照,更能见出郑观应证道之言背后的心酸和悲凉。

不过,郑观应并没有就此走上逃禅避世的逍遥

之途,其“己酉本诗草”自序所谓“故自忘鄙俚,复随手写录,几不成为韵语,或五言,或七言,寓意规谏,大声疾呼,以期上下一心,重见唐虞盛世。”恰恰表明他的救世度人之志并未消退,而是挫而弥坚。^③

诚如“己酉本诗草”自序所言,该集中的诗多为“寓意规谏,大声疾呼”之作,亦如“谈玄诗草”自序所言,该集中的诗概属“辨道之诗”。所谓“寓意规谏,大声疾呼”之作,也就是政论诗,或称“救世诗”“实业诗”,从创作意向上来看,类乎杜甫、白居易的讽谕诗,如“三吏”“三别”,以及《观刈麦》《卖炭翁》《新丰折臂翁》《上阳白发人》之类,从这些诗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儒生;所谓“辨道之诗”,也就是悟道畅玄、记录潜修之心得与感悟的诗作,类乎魏晋时期以演绎玄理为内涵的玄言诗,从这些诗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修生养性的道士。除了入世的讽谕诗、出世的玄言诗之外,郑观应的《罗浮待鹤山人诗草》中也穿插着一批寄情遣兴之作,这一类诗或记游,或写景,或状物,或题画,或抒怀,其中既有闲适之作,亦有感伤之作:

秋夜即事

旅馆乏知音,横琴思往哲。
西风卷地来,吹冷窗前月。

暮春有感

行携经卷任西东,俯仰因时道未穷。
一纸家书归雁后,五更乡梦乱山中。
离情缱绻随垂柳,旅鬓萧骚感断蓬。
愁杀江南春已暮,鹧鸪声里落花风。

游西贡花园

破浪南来泛碧槎,探奇深入路三叉。
澄潭倒影闲过鸟,密树凝香乱着花。
席地笑谈蛮女俗,沿江耕获野人家。
海墉莫道无春色,伫看金铃护碧芽。

沪上画梅赠梁纶卿

苹末风来午梦闲,客中延赏足开颜。

^① 见上海城北着易堂铅印《罗浮待鹤山人诗草》封面,清宣统元年(1909年),上海图书馆收藏。

^② 《郑观应年谱简编》1898年6月16日,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附录2。

^③ 郑观应在1908年于澳门郑慎余堂寓所辑成《盛世危言后编》,距其着手辑着《盛世危言》(1886年),相隔22年,更可确证其济世之心的坚定、持久。

石栏雨过苔添润,芳径花疏草不删。
曝蠹虚窗翻古帙,调鹦画阁倩雏鬟。
一枝写订归期约,花未寒梅问故山。

题澳门新居之二

三面云山一面楼,帆樯出没绕青洲。
侬家正住莲花地,倒泻波光接斗牛。

以上诗作情致各异、气韵生动,颇见艺术功力与文人性情,似可循“文人画”得名之故例,将这类寄情遣兴之作统称为“文人诗”。

在郑观应的讽谕诗、玄言诗、文人诗这三类诗作中,讽谕诗的数量最多,体式、题材最丰富,影响也最大,充分显现了郑观应这位启蒙思想家的“救国苦心”,令人感受到浓烈的杜甫、白居易式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颇有诗侠之风。不过,诗歌毕竟是一种艺术,具有超功利的审美特质,一首有着很大政治意义、社会反响但艺术价值甚微的诗作,只能说是好的宣传品,不能说是一首好诗。郑观应也深知他的“不避嫌怨,不拘格调”之作,虽有振聋起衰、唤醒民众之功,却未必能登“大雅之堂”。

二、郑观应对《沧浪诗话》的引用及《沧浪诗话》之要义

从“己酉本诗草”自序可以初步推断出,严羽《沧浪诗话》所谓“吟咏性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入神”之境,才是郑观应心目中的理想诗境。这篇自序是迄今所见的郑观应著述中篇幅最长的“诗论”。所谓篇幅最长,也不过只有短短两段,其中第一段复述了《沧浪诗话(诗辨)》中的几段话;第二段则是自陈“本不能文,何敢言诗”,却又不能不写诗,明知“既不取法古人,又无入神之句”的诗作“不足以登大雅之堂”,却又将其结集出版的苦心。

郑观应在主要诗集的自序中一开篇就大段复述《沧浪诗话(诗辨)》中的观点,足可见《沧浪诗话》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不过,郑观应的复述与原文有一定出入,由于不便一一指证,兹将《沧浪诗话(诗辨)》相关段落的原文照录如下:

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其用工有三:曰起结,曰句法,曰字眼。其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性情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

对照《沧浪诗话》原文与郑观应的复述可以发现,两者间的种种出入,固然有错漏疏失之处(如误“不落言筌”为“不涉言筌”),但大多是郑观应自以为是的改动(如将“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压缩为“诗而入神,至无尽矣。”又将“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转述为“其真妙透彻玲珑不可凑泊”),这就意味着郑观应对《沧浪诗话》相当熟悉,其中的主要篇章他恐怕曾经熟读成诵、熟记于心,所以在需要引用的时候,提笔就写,也没想到要核对,这样的自信,恰恰表明了郑观应对《沧浪诗话》的领会之深。

《沧浪诗话》是宋代最负盛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全书以禅理印证诗道,分为《诗辨》《诗体》《诗法》《诗评》和《考证》五门。《诗辨》一门是全书总纲,鲜明地提出了论诗宗旨,大要在一“识”字。因为“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所以“学诗者以识为主”。“识”的内涵,即是禅宗所谓“妙悟”。由妙悟而达于诗艺之极境。具体说来,便是以汉魏、晋、盛唐之诗为第一义的效法对象,加以朝夕讽咏,久之自然悟入,也就是领悟到“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最高诗歌艺术境界。《诗评》举例评析汉魏以来诗歌,进一步阐明汉魏、晋、盛唐诗为第一义的理由:“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

概而言之,严羽的诗论有以下要点:在创作动机上,崇尚“意兴”“性情”;在诗歌境界上,崇尚“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入神”之境;在学诗方法上,崇尚师古人之诗以求“妙悟”,也就是通过熟读具体作品而不是研读诗歌理论以领会诗艺的真谛;在历代诗歌的评价上,推崇汉魏、晋、盛唐之诗,尤重李杜之诗,可以说是开了尊唐的风气。

就严羽所提倡的不涉理路、意在言外的美学风

格及其以宗教印证诗学的特点来看,严羽的诗论作为中国“神韵派”的开山之作,确与西方的象征诗论“弘纲细节,不约而同”^[3]。钱钟书在评价法国神甫白瑞蒙所著《诗醇》时说,该书“发挥瓦勒利(通译瓦雷里)之绪言,贵文外有独绝之旨,诗中蕴难传之妙,由声音以求空际之韵,甘回之味。举凡情景意理,昔人所藉以谋篇托兴者,概付唐捐,而一言以蔽曰:‘诗成文,当如乐和声,言之不必有物’……五十年来,法国诗流若魏尔伦、马拉美以及瓦勒里辈谈艺术主张,得此为一总结。”^[3]白瑞蒙在《诗醇》续篇《祈祷与诗》中,将“祈祷”与“诗”相提并论,这种论诗思路与“神韵派”之沟通“禅”“诗”,有异曲同工之妙。白氏以为,“诗中之音韵腔调,发而中节,足使诵者心气平和,思虑屏息”,故“诵诗”者的“心境”恰“与祈祷相通”。^[3]他又总结克洛岱尔(Paul Claudel)等“浪漫主义”“象征派”诗人的观点说,“诗不涉理,本于神而非本于心也”,钱钟书指出,这正相当于《沧浪诗话》所谓“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3]白氏又以为“教诲、叙记、刻划,使人动魄伤心,皆太着言说,言之太有物。是辩才,不是真诗。”钱钟书指出,这又相当于《沧浪诗话》所谓“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终非古诗。”^[3]无疑,钱钟书之以严羽的《沧浪诗话》与白瑞蒙的《诗醇》及《祈祷与诗》中的观点相参证,既是对白氏诗论所涵盖的西方“浪漫主义”及“象征主义”思想的一种“阐发”,也同时印证了西方象征诗论与中国神韵派诗论(钱钟书所谓“严仪卿以来神韵派之议论”)的相通性。就后一点而言,严羽称得上是中国象征主义诗风的有力倡导者与辩护者。

在深层的审美理想上,郑观应向往严羽的“入神”之境,企慕“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最高诗歌境界,然而,在他的创作实践中,却出现了与自身诗学理想相悖的创作意向。

三、郑观应的诗学理想与创作意向之对立

郑观应自谓其诗“寓意规谏,大声疾呼”,又“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直记时事,不避嫌怨”,这样的创作意向流露出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旨趣,与严羽的象征主义诗论存在显著的差异与对立。其“寓意规谏”的创作动机,乃是出于“救国苦心”,不同于严羽所谓“吟咏性情”;其“以议论为诗、直记时事”之过着痕迹的表达方法,正好与严羽所推崇的“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之“无迹可求”的象征

手法相异。其所谓“既不取法古人,又无入神之句”云云,则似乎是在和严羽的“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以及“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之说唱反调。郑观应又说,其诗虽“不足以登大雅之堂,‘但救国苦心妇孺皆知,一览即印入脑际,或于数十年后,无人不忆及当时事势’,则俨然是视其济世之诗为‘诗史’了。”

前文提到,清末诗人刘麒祥、萧荣爵分别以“诗情如杜甫,雅韵若青莲”“伤乱每编王粲句,感时常写杜陵篇”称许郑观应,他们的共同点是,将郑观应与杜甫相模拟,萧荣爵所谓“杜陵”,即是杜甫。杜甫尝居京兆杜陵,故自称“杜陵布衣”“杜陵野老”,后人诗中常简称为“杜陵”。杜甫有“诗圣”之誉,其诗有“诗史”之名。所谓“感时常写杜陵篇”,应该是指郑观应的笔下常有杜甫式的反映时事、针砭时弊、旨在“重见唐虞盛世”(也就是杜甫所谓“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批判现实主义之作。翻阅郑观应的“己酉本诗草”,确有大量体现着杜甫、白居易式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记事、警世之作,如《答黄幼农黄花农蔡毅若岑馥庄四观察论时事》《赠驻美国副使容纯甫观察》《与日本驻沪小田切领事论时事作歌并序》《中日变政志感》《高丽使臣函问时事书此代柬》《书抵制美国禁华人入口》《闻中法息战感赋》《书东三省俄兵暴虐事》《铁厂歌》《开矿谣》《商务叹》《劝农歌》《鸦片吟》等等,这些诗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既是一部外患内乱、革故鼎新的中国近代史的缩影,也是一代苦苦求索的爱国士子的心灵史,它们不但勾勒出了客观历史的起伏线条,而且还包孕着精神历史的深沉底蕴,确实称得上是感时而作、济世情切的“杜陵篇”;就这些诗作反映时事、时局的广度与深度来说,也确实配得上近代“诗史”这个称誉。

既然郑观应的诗作多为“直记其事”的“杜陵篇”而非意在言外的神韵诗,既然郑观应的以书写“诗史”自命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与他熟稔于心的神韵派诗论有前述的多重差异与对立,那么,郑观应是否真的在“感时常写杜陵篇”的同时,心慕“神韵派”,也就是以严羽的象征主义诗境为其诗学理想呢?或者他根本就是以严羽所谓“入神”之境的虚渺反衬其“入世”之作的现实意义呢?

笔者以为,郑观应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与严羽的象征主义诗论的差异与对立,确实体现了其诗学理想与创作意向的对立,但这种对立并不意味着郑观应在诗学观上的自相矛盾,只是凸显了艺术

理想与现实需要的差距。

郑观应自称其诗“既不取法古人,又无入神之句,不足以登大雅之堂”,或有自谦甚至反讽成分,但他所谓“中人以下与泛泛吟咏不同。且文字尤贵显浅,是直可为拙诗藏拙也。尚冀吟坛诸君勿谓入口无味,以其覆瓿,则余之幸也夫!”则无疑是肺腑之言。换句话说,郑观应深知自己的“直记其事”“不计工拙”之诗或许会有“入口无味”之弊,难称“大雅”之作,但出于“救国苦心”,他还是要以诗的形式“大声疾呼”,以达到启蒙觉世的功利目的。这正是少学老庄(“谈玄诗草”所谓“观应童年,愿学老庄”)、“不愿封侯愿学仙”(《狂吟》)^{[4]1302}的郑观应的无奈,也是他的伟大之处。他本可自度,却不满足于自度,他还要救世度人;他本可唯美,却不甘于唯美,他还要以诗劝世。套用李泽厚的话来说,这是救亡压倒了审美。也就是说,郑观应出于“为人生”的目的而在一定程度上搁置了他的诗学理想,其苦心孤诣,不能不令人动容。

细察郑观应的诗作,他并非没有对“入神之句”的追求,如其寄情遣兴之作中表现出的审美倾向;他也并非没有“取法古人”之处,在他的诸多诗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李白、杜甫等古代诗人的痕迹,前文指出,胡昌俞、刘麒祥、萧荣爵等人对郑观应诗艺的评价直指有“诗仙”“诗圣”之誉的李白、杜甫,刘麒祥称郑观应“诗情如杜甫,雅韵若青莲”,胡昌俞则说“陶斋为诗不规规于太白,而甚似太白,……以陶斋胸怀浩荡,固天际真人之邈不可攀者,直上与唐贤相颉颃。”这样的评价确有一定道理。关于“诗情如杜甫”,前文已从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承继等方面作了论证,此处仅补充一例,郑观应在《敬次彭雪琴宫保师海南军次秋兴二十四章原韵》中有“勋业同时推李郭,文章千古继欧韩。西平草窃犹滋蔓,恶作还须斩万竿”之句,并自注曰:“借用杜句”^{[4]1264},这是自陈其“取法古人”了,所谓“文章千古继欧韩”,也表明他并不排斥“取法古人”,只不过对于“大声疾呼”的“救世诗”而言,贵在以“显浅”之语直话直说以使“妇孺皆知”,而不必参究名家句法,也不必追求神韵。

再来看李白对郑观应的影响。前文提到,郑观应虽不足与“诗仙”“诗圣”并称,但其人有血性,其诗有奇气。具体而言,郑观应诗中的奇气,就是李白式的仙侠之气。胡昌俞以为郑观应之诗杂有“仙心”,还只是看到了他的仙气,未道出他的侠气。纵观郑观应的诗作,无论是救世诗、辨道诗,还是寄情

遣兴之作,常能感受到一种俊逸之气,或仙或侠,确实给人以“甚似太白”之感。郑观应好写古风,其诗英气俊发,激昂慷慨,大有李白之风。兹将李白、郑观应的《侠客行》照录如下:

侠客行

李白

赵客缟胡纓,吴钩霜雪明。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
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
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
救赵挥金锤,邯鄲先震惊。
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
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侠客行

郑观应

有客虬髯容貌异,冒雪驰来策蹇卫。
揖我直上酒家楼,邂逅天涯如夙契。
客言廿载事猿公,珍重吴钩未轻试。
斫地能令鬼魅愁,亘天倏见长虹气。
巨觥满饮恣雄谈,意气干霄绝侪辈。
酒酣拍案忽纵歌,起立苍茫拂衣逝。
街柝沉沉夜未央,高秋一叶从空坠。
手提革囊掷我前,取出头颅血痕渍。
为言此是负心人,怨衔十稔今始遂。
瞥然躡举去无踪,使我舌拮魂魄悸。
矫首仰望心怦怦,世事只今多不平。
安得此君千百辈,杀人如草不闻声。

郑观应盛推“李杜”,其诗曰“酒兴诗豪一散仙,醒时工部醉青莲”(《赠潘剑士》)^{[4]1404}、“共羨如椽一枝笔,百篇斗酒绍青莲”(《赠李次青方伯时同在海南军次》)^{[4]1265}。所谓“醒时工部醉青莲”,大可理解为以杜诗入世,以李诗出世,简直就是郑观应的自我写照。笔者以为,郑观应与严羽诗论的相契,一方面是因为郑观应好修道,道心通禅心,“禅道惟在妙悟,诗道惟在妙悟”,严羽的以禅理印证诗道,应当甚合郑观应的心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都以李杜为尊,以盛唐为尊。《沧浪

诗话》曰:“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郑观应则在诗集自序中转述为“诗而入神,至无尽矣。斯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甚寡。”词句虽有变动,推尊李杜之意却无二致。此外,从郑观应对《沧浪诗话·诗辨》篇的取舍,还可以看出他是“尊唐”派。《沧浪

诗话·诗辨》篇本以汉魏、晋、盛唐之诗为第一义的效法对象,但在郑观应的诗集自序中,独尊盛唐诸人。由郑观应对李杜及盛唐诗的推崇,更足以证明郑观应对严羽的“入神”之论及师法古人之说的貌拒实崇。

[参考文献]

- [1] 陈永正主编《岭南文学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2] 邓景滨《郑观应的诗歌创作观》,《岭南文史》1995年第2期。
 [3] 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第88则,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4]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The Artistry and Poetics of ZHENG Guan-ying, an Enlightening Thinker

GONG G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University of Macau, Macau 00853, China)

Abstract: Unlike the implied poetry of Shenyun, Most of ZHENG Guan-ying's poems are straight depiction just like the style of Du Fu's poems. There are multiple difference and opposition between his spirit of critical realistic creation of "poetic history" and the poetics of "Shenyun School" clinging to his heart. However, the opposition does not mean that ZHENG Guan-ying stultified himself in his Poetics, but highlights the gap between artistic ideal and actual demand. ZHENG Guan-ying clearly knew that his salvation-poems were not elegant works, but out of his patriotism, he still made use of the form of poetry to achieve the utilitarian purpose of enlightenment. For the above reason, ZHENG Guan-ying was a helpless, but great man who would like to admire LAO Zi and ZHUANG Zi. He preferred save others to save himself. Besides, he would tend to the Aestheticism, but he Urged the world. This situation can be called "the salvation overwhelms the aesthetic". Namely, proceeded from the purpose of "for life", he laid aside his poetic ideal to a certain extent. Therefore, he deserved the reputation of "the Poetic Knight".

Key words: ZHENG Guan-ying; poetic ideal; the intention of creation; Canglang Poetics

(责任编辑 赵明)